

## 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郝时远

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

——《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类社会形成的新的文明观，是伴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危害而出现的新理念。对自然界而言，生态平衡的基础是生物多样性及其所维护的生物链的完整性。对此，人类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并为保护、恢复、甚至重建这一基础而付诸于全球性的行动。那么，对人类社会来说，世界和平的基础是什么？这是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的奥秘和悬而未决的重大议题。

### 一、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人类是统一的，文化是多样的。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体，承认人类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的多样性，反之亦然。承认人类生物学意义上及其许多与生俱来的生理共性是从人类进化的过程而言的，承认人类多样性则是从文化创造的进程来看的。这种理解，是与西方传统中有关人类起源“多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相对立的观念。

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中不难看出：“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sup>1</sup> 各民族之间的人文差异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境中认识自然、认识自我产生的创造。正如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所说：“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互不相同，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sup>2</sup> 不同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解决所面临的不同困难的方式方法，是人与自然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即如江河湖海的舟楫之便，大漠草原的畜牧迁徙，山地森林的刀耕火种，冰雪极地的捕捞游猎，等等。这些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表现的发展方式差别是直接依托于这些方式的创造者面对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作出的独特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多样性的文化。

根据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的观点，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密切，虽然学术界对这种互动关系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sup>3</sup> 但是在生物多样性地区表现出文化多样性是普遍规律。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们的生存资料来源、种类不同，由此产生的索取、利用方法也不一样，这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所形成知识、经验、行为、技术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影响所决定的是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而非文化优劣的差别。

古往今来，人类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一直处于非文明的状态。惧怕差异、排斥差异、消除差异成为人类社会过程中的主流意识，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战争几乎充满了

<sup>1</sup>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1页。

<sup>2</sup> 【印】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页。

<sup>3</sup> 如“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两者的对立和取代（或综合）等“生态学观点”。参见【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人类历史。作为这种实践的一些理论和观念，也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诸如西方人的“环境决定论”对多样性文化的优劣评判，“种族主义”对体貌特征进行的人种优劣鉴别，乃至“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观念至今仍表现的傲慢，都在挑战人类的统一性和排斥文化的多样性。即便是生物学为人类的统一性提供了足够的科学依据之后，“人们虽然承认人类的统一性，但同时又倾向于把它分隔为高低不同的种族。民族权利虽然受到承认，但一些民族却自认为高人一等，并赋予自己指导或统治全人类的使命。”甚至可以说“生物学对人类统一性的确认丝毫未能削弱对人类进行优秀种族和低劣种族的等级划分。”由此决定的文化观、文明观也是如此。以致于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出现了“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的种种悲剧；<sup>1</sup> 以至于在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形形色色乔装打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兴”，仍在试图证明“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必定是相互联系的”规律；<sup>2</sup> 甚至为了维护这种所谓“规律”，“文明冲突论”的创造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sup>3</sup> 通过如此恐怖的图景来维系西方世界的团结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拥戴从而构建美国“单极世界”的霸权，目的就是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民族(nation)设计“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前途。然而，“历史表明，哪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哪里文明就繁荣兴盛；而不能容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并不能与之合作，文明便衰落。”<sup>4</sup> 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也将继续证明这个定理，这也是文化多样性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原因。

统一不是一样，统一决不意味着单一的种族、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当代世界对人类统一性的认识，除了从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解外，要求人们以全人类的视野对文化多样性进行思考，在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人类的统一性，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现代化可以产生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水准，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但这个过程“不是通过摧残文化的同质化，而是通过文化多样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来实现的。<sup>5</sup> 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承认那些产生不同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前提具有同等合法性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成为可能：这是在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sup>6</sup> 这是一种面对全人类的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的观念。

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可以维护生态平衡，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必然引起歧义和冲突？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为什么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问题并不在于物种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范畴区别，问题在于人类的观念。事实上，改变“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努力一直在继续，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都反映了这种观念的变化。但是，这些理论也存在着不同的缺陷，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强调“纯洁性”的“冷冻主义”，从而排斥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吸收的互动关系。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强调的多样性并非各自孤立的多元性，如果借助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文化多样性注重的是多样性的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编织了有机的人类统一性，而且它“并不妨碍统一化和再次多样化的进程在更广泛的层次展开。”<sup>7</sup>

<sup>1</sup>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9、79页。

<sup>2</sup>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93页。

<sup>3</sup> 【美】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sup>4</sup> 【意】L·L·卡瓦利-斯福扎、E·卡瓦利-斯福扎：《人类的大迁徙》，乐俊河译、杜若甫校，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sup>5</sup>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第53页。

<sup>6</sup>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页。

<sup>7</sup>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第53页。

## 二、中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两种资源”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努力。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目前的发展程度和均衡性仍处于初级阶段。例如，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8.41%，但是其人口总数已逾一亿且主要聚分布聚居在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地理视野中的西部地区，也是中国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区。

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大大高于汉族人口的同类比例。消除贫困是实现人权的基本前提，因为“极端贫穷的广泛存在妨碍人权的充分和有效享受”，<sup>1</sup> 同时“贫困和社会衰落，对保护人权来说，也是严重的危险。”<sup>2</sup> 中国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观，是对人权本质的深刻理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1978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 2.5 亿。20 多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政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大的特点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sup>3</sup> 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到 2002 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 2820 万人。在摆脱贫困的 2.2 亿人口中，少数民族地区达到 3600 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和成效不仅为全球减少贫困的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发展、共同富裕的权利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目前，中国的 2800 万贫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中国政府确定的 592 个扶贫重点县中有 341 个（57.6%）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仍有 1000 多万。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到 2010 年最终解决贫困问题，并把扶贫的重点确定为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消除贫困、解决温饱的任务对中国来说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解决科学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却刚刚开始。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两种资源”的保护问题最为引人注目。所谓“两种资源”就是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根据对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排名的基本状况：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排名：**西藏（31）、贵州（30）、内蒙古（29）、新疆（28）、云南（27）、广西（26）、海南（25）、甘肃（23）、青海（21）、四川（20）、宁夏（18）。

**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排名：**西藏（31）、青海（30）、贵州（29）、云南（28）、海南（27）、甘肃（26）、宁夏（24）、广西（21）、四川（18）、内蒙古（10）。

**区域教育能力排名：**西藏（31）、青海（30）、贵州（29）、海南（28）、四川（27）、广西（24）、云南（22）、甘肃（21）、宁夏（20）、内蒙古（14）、新疆（8）。

**区域科技能力排名：**西藏（31）、贵州（30）、青海（29）、内蒙古（27）、新疆（26）、海南（25）、广西（24）、宁夏（23）、云南（21）、四川（17）、甘肃（15）。

**区域管理能力排名：**青海（31）、贵州（30）、海南（28）、内蒙古（27）、新疆（26）、四川（25）、甘肃（24）、云南（22）、西藏（18）、宁夏（17）、广西（16）。

**区域生态水平排名：**宁夏（31）、甘肃（30）、新疆（29）、青海（28）、内蒙古（26）、四川（21）、西藏（20）、云南（18）、贵州（12）、广西（10）、海南（4）。

**区域环境水平排名：**西藏（1）、海南（2）、青海（3）、新疆（4）、甘肃（5）、云南（6）、

<sup>1</sup>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世界人权大会 1993 年 6 月 25 日，维也纳。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国际人权文件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页。

<sup>2</sup> [瑞士] 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sup>3</sup> 例如，1994—2000 年间，国家扶贫资金的 38.4%（432.53 亿元）投向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

内蒙古(9)、四川(11)、广西(19)、贵州(22)、宁夏(24)。<sup>1</sup>

从这些排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人为的发展能力方面基本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唯一名列前茅的是以排放强度指数和大气污染指数为指标的**区域环境水平排名**。但是,空气污染水平低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状况的良好,只是显示了工业排放能力低的现状。事实上,从上列由生态脆弱指数、气候变异指数、土壤侵蚀指数所构成的区域生态水平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排名仍旧是位居末端。在由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指数构成的**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排名**突出的反映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西藏(31)、贵州(30)、四川(24)、宁夏(22)、云南(21)、甘肃(20)、新疆(19)、青海(17)、广西(15)、海南(9)、内蒙古(4)。

中国的西部地区不仅是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而且是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厚的地区,是中国文化宝库中最具斑斓色彩的资源。这些依托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间史诗、饮食、服饰、医药、建筑、生产技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保护、利用和传承这些文化,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题中之意,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条件下,地方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和民间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发展”。

发展,意味着变化;但是变化,并不等于发展,因为发展的意义在于进步,而变化则包括了恶化。在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根据2001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主要问题包括水土流失、草原和耕地沙化、森林系统调节功能减弱、河流断水、湖泊萎缩、各种自然灾害加剧等。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sup>2</sup>也就是粗放型经济所导致的破坏性资源开发,如草原开荒、超载放牧、森林滥伐、湿地围垦等。这些经济行为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的直接后果。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例如,在大兴安岭地区从事驯鹿业生产的鄂温克族,就因森林地区的过度开发而造成驯鹿业的衰落和生态移民,其传统文化也因此处于了碎裂和融散的状态。

保持现代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全球性问题,包括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科学处理这一问题的任务。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生活由于缺乏市场和技术的推动而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有限。因此,“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塞芒人所起的污染作用在性质上——而且在概念上——不同于当今采用尖端技术的50亿人所起的污染作用。塞芒人当然不会反省自己正在对河流或森林起什么影响。这种‘自满自足’在近代以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个能使河流甚至大海变成工业下水道和处理废物的垃圾堆场的世界中,它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正在消失。”<sup>3</sup>可悲的是这种消失是在没有或缺乏对其合理性继承基础上的消失,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我们的昨天毫不珍惜的否定。人们更愿意关注和解读那些辉煌而震撼的古代文明遗迹,而对我们身边的那些同样代表文明因素的文化现象正在迅速消失却无动于衷、甚至心存鄙薄地坦然处之。事实上,无论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还是畜牧迁徙,其中都包含了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相互依存、平衡相处的传统智慧。这些知识的发掘、传承、科学提炼并使之成为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民间知识源泉,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sup>1</sup> 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0—425页。

<sup>2</sup> “环保总局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新华网,2001年12月30日。

<sup>3</sup>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吴象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近年来,中国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日益增强,生态工程和文化工程已经作为国家行为不断推进。在国家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在这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在重点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的同时,调整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构,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环境进行自然恢复、人工建设,对天然林地、草场、湿地进行严格的生态保护。<sup>1</sup>为此,中国不仅广泛地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而且也不断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其中,已经启动的“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评估工作,就是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重建工程设计的。与此同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也进入了立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中的文化含量显著提高。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为了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这是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因此,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开发实践中,保护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基本理念。

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一些著名的口传文学(史诗)的搜集、采录、整理、出版外,<sup>2</sup>少数民族古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规范性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成分,如民居、服饰、器用、饮食、节日、医学、丧葬、传统工艺、古迹等,也通过博物馆、旅游业、社会化、国际交流等形式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2000年云南省率先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发展规划,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当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发掘、利用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这种保护、利用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观念,不仅在西部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东南沿海和内地一些省也纷纷制定了建设文化大省或文化强省的规划。<sup>3</sup>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全国性的行动也在陆续展开。2004年3月,“中国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民歌保护行动”发布的成果,展示了侗族、瑶族、壮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藏族、回族等10个民族的235名民间歌手录制的385首民歌,则反映了文化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新进展。

可以说,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进程中,“两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不仅已经形成共识,而且也付诸了行动。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揭示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状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文化保护、文化产业化、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实现这种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仍面临着诸多挑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民族文化流失的现象仍在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与“两种资源”保护的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等等。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突出内容。

### 三、文化多样性互动中的民族关系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各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也决定了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即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一点从上文所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科技、管理能力的排名中不难体会。因此,观察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也必须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区域。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抉择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必由之路,事实已经证明

<sup>1</sup>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目标是2010年达到1800个,总面积占国土面积16%左右,9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

<sup>2</sup> 如最著名的民族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大型传统音乐经典套曲《十二木姆》等高级文化无形遗产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sup>3</sup> 如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南、甘肃、江苏、河北、黑龙江、深圳等省市的文化建设规划。

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的发展进程对整个国家迅速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在发展，但是速度要慢一些，这也造成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影响国内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最重大因素。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一方面这些地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享有的某些优惠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难以为继或效益不彰，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由于人才、资金、基础设施和经营管理水平严重不足等条件的制约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缺乏竞争能力。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比较效应及其所产生的消极、不满情绪，在民族政策层面也表现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疑虑。

中国东部地区先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全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基本目标。随着东部地区发展及其在增强整个国家发展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支持日益增加，并在世纪之交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步骤，是为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实现各民族之间充分的平等、团结和互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正在通过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来实现真实的、充分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目标，平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地位方面，而且包括了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团结是实现平等的保证，也是平等实现程度的体现；互助是维护团结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各民族利益整合的保障。目前，就区域经济关系而言，东部地区和发达省市与西部地区已经结成了稳固的、日益发展的互助合作关系。<sup>1</sup> 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市场、产品的结合，不仅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加快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成就是显著的。

当然，西部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东西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以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和科技创新能力构成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区域发展动力排名中，全国平均水平为47.15%，东部地区为63.30%，西部地区为29.67%。其中上海、北京分别达到93.86%和91.62%，而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处于35%以下，最低的是西藏18.31%、贵州21.34%。<sup>2</sup> 不难看出，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我发展动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决非短期内可以实现。因此，中国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解决民族问题成就显著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问题都属于现阶段所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前苏联曾经提出过“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估计，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维埃联盟却因为民族分裂而解体。民族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恐怕在世界范围还没有哪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说已经完全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不一样。中国解决现阶段的民族问题突出了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现代化目标后就不存在民族问题。事实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总体上欠发达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显著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展现了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包括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某些后现代因素。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影响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新特点和新因素。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关系最显著的影响是族际之间的

<sup>1</sup> 这种互助关系的典型模式是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省、市支援西部地区，如：北京—内蒙古，天津—甘肃，上海—云南，广东—广西，浙江—四川，山东—新疆，辽宁—青海，福建—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贵州、全国—西藏，等等。

<sup>2</sup> 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互动。市场化、城市化、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前所未有地推动人口的流动。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在数以亿计的主要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多，而且主要的流向都是东南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是唯一具有56个民族成分的地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则表明全国具有56个民族成分的省区达到了11个省区，具有55个民族成分的省区为17个。<sup>1</sup>一些发达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享有当地户籍的少数民族人口，如2002年广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19万，是该市户籍少数民族人口的4倍。这类现象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十分普遍。反之，汉族流动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中国各民族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族际交往日益广泛和密切的时期。

其次，日益广泛的族际互动关系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流。流动人口虽然离乡离土，但他们仍旧是民族文化、民间习俗的承载者。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和汉族文化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带入地方的、民族的文化特点。近些年来，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不断进入全国的市场流通外，以餐饮业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风味已经大举进入各个城市，并形成了城市生活中独具特色的消费品牌。此外，少数民族艺术、服饰、医药、建筑等文化形式，也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之电视、传媒和网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作用，使文化多样性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象征。可以说，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感受到多民族互动的特点，而这一现象只是中国文化多样性融汇交流大趋势的开端。

第三，如前所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的估计必须立足于中国13亿人口这一基本国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只是开始，截止到2000年全国的城市也只有663个，城市化水平只有36.09%，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85%的水准。<sup>2</sup>按照中国在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要提高到75%，这也就意味着每年将有1000—1200万乡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因此，目前的人口流动和族际互动只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但是这一方兴未艾的进程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互动关系和文化多样性在城市生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在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就业、语言、子女教育、宗教活动、饮食习惯、丧葬习俗等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文化适应，对城市管理、城市生活、族际关系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并有效地保障其权益的问题。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民间层面的许多民族问题都反映在城市生活中。这也是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政策、法规普遍制定的原因。自1993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以来，很多省市都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如《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1994）、《北京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1998）、《浙江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2002）、《吉林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2002）等。<sup>3</sup>同时，国家层面的《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障条例》等也在制定之中。这些条例的制定，反映了中国各民族进入更大范围散杂居的发展趋势，也揭示了民族关系更普遍、更基层的层面，即城市化、社会化和生活化。

第四，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所推动的族际互动大趋势，不仅正在逐步改变民族聚居的状况，而且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双重的：

<sup>1</sup> 参见周方：《解读五普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国民族》2003年第9期。

<sup>2</sup> 2000年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为：美国94.7%、英国89.1%、法国82.5%、德国81.2%、日本77.9%。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230页。

<sup>3</sup> 还包括湖北、湖南、云南、广东、广西、辽宁、贵州、黑龙江、山东、江苏等，一些城市如武汉、哈尔滨也制定了相应的条例。

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外就学、就业、经商、打工取得的观念变化和经济效益对其祖籍地的家庭、亲属、乡亲、村落、甚至地区产生了示范性影响，促使更多的人走出去并对家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现代化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伴随着电视、流行歌曲、休闲服装、旅游业等大众消费文化形式逐步深入农村、牧区和山寨。另一方面，迫切改变经济生活困境的愿望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又对民族的自身发展产生着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的流失、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

就普遍意义而言，农村“是民族的保存者”。<sup>1</sup>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习俗由于比较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得以保留和传承。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市场经济推动的地区之间、族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很多传统因素会在这种互动中发生变异、甚至流失。在中国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流失状况加剧 据语言学界的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正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120种以上。但是各语言的使用人口极不平衡，使用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语言只有35种，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语言也只有51种。也就是说，有大约70种语言的使用者在1万人以下，有的语言实际上只局限于某些村落、甚至一些老人。这种状况与全球6000多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据语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的测度指标，不具有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体、文艺、宗教、经济、信息活力的语言，则属于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up>2</sup> 例如赫哲语、满语、畲语、塔塔尔语等1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都处于1000人以下使用的濒危状态。其中，根据2000年的调查统计，仅有19名60岁以上的老人程度不同地可以讲赫哲语。<sup>3</sup> 同时，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没有文字，在诸多语言活力的测度指标中不具有活力，所以语言资源的流失不仅在继续，而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向。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流失不仅意味着民族特性的弱化，而且语言承载和表达的民族文化因素也将随之流失。

2、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产生的负面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资源条件，是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优势。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西部地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旅游业的兴盛一方面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扩大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市场在规划和管理方面尚不完善，人为的旅游设施建设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服务行业和游客造成的环境污染，文化项目开发中存在的猎奇取向，对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两种资源”保护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民俗也作为旅游项目来进行开发，最典型的是云南泸沽湖地区摩梭人的传统“走婚”方式也被作为游客的“体验”项目，以致造成当地出现了色情行业。这种畸形发展的现象虽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却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3、族际互动交流中的文化适应与摩擦 如上所述，中国的民族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族际互动阶段。在民间层面突出地表现出各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特别是随着少数民族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少数民族在逐步摆脱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增强自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应地也增强了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在城市生活和汉族群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特点的过程中，某些传媒报道、文学描述、影视作品和生活接触中也存在猎奇、想象、曲解、甚至出现侮辱性的成分，由此引起少数民族群体性、地区性的反应也明显增多。

<sup>1</sup>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sup>2</sup> 参见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sup>3</sup> 参见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4、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性(ethnicity)取向 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正在为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所普遍认同。同时,汉族地方性文化的发掘和光大、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汉族聚居地区,区域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强化着维护文化边界的观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维护强化着族群边界的意识。这种取向,在现代化文化整合的大背景下又表现出分化的特点。这种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性特点,一方面无法抗拒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又在努力维护和塑造地方的、族群的文化特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现代化发展出现的矛盾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的民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族际互动日益密切和广泛的时期,民族关系所关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内容更加具体化和多样性,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整合时期。当然,这一过程对中国来说还只是开始,市场经济、城市化、人口流动及其伴随着的婚姻关系等因素,将长期、持续地推进这一趋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也会继续增多,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民族问题增多,是族际互动关系日益密切造成文化差异性凸显的结果,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靠同质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要通过强化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来消弭矛盾。承认文化差异的目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强调各个文化类型的天然独立性。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中华夏的“五方之民”<sup>1</sup>一直处于互动状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的过程一直在继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维系和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历史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表现了从相对聚居到越来越普遍的散杂居发展态势。在这种发展态势中,各民族离散群体(diaspora group)的增多和文化多样性的交汇,对民族关系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同化现象、异族通婚、少数人权利、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族群社区、等等,这些现象不仅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目前关注的研究热点,而且也是国家民族政策正在发展和完善的内容。

从人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整合与分化,事实上就是统一性和多样性交替显现和不断发展的体现。因为“统一以一个组成部分居于统治地位而其他部分处于从属地位为基础,而整合则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因为它是在组织的一个共享的社团层次上发生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sup>2</sup> 人类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只有承认多样才能认识统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事实上也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需要通过发展来竞争,而不是通过对抗来争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帝国霸权的时代行将结束,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正在形成,和平代表着公正与平等,发展预示着进步与繁荣,没有和平不能发展,没有发展不能进步。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主导的世界事务,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维护和平需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促进发展需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联系。因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直接遇到了文化、文明问题和生态问题。”<sup>3</sup> 所以,“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由内在的、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的文化——即相互依存的文化——来贯穿,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重要。”<sup>4</sup> 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并给予充分的尊重,正是来源于这种非常重要的依存关系。

<sup>1</sup> 参见陈澧注:《礼记集说》卷三,“王制”,《四书五经》中册,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74页。

<sup>2</sup>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36页。

<sup>3</sup>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第69页。

<sup>4</sup>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9页。